



“夫妻警务站”：全力当好平安乡村守望者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汪勇

在湖北省宜都市,有个“夫妻警务站”——高坝洲镇青林寺村警务站,民警余志明和辅警余文玉是夫妻,两人携手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青林寺村警务站组建两年来,余志明、余文玉夫妇化解矛盾纠纷116起,协助破获刑事案件7起,协助抓获逃犯3人,协助兄弟单位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站点,大事不出村组,矛盾不上交”。

夫妻安心到基层

青林寺村是典型的城乡接合型社区,辖4个自然村27个村民小组,共2630户8752人。2020年,已是宜昌市公安局高坝洲派出所教导员的余志明放弃到宜都市公安局机关工作的机会,主动请缨,下沉到青林寺村警务站驻守。考虑到站里工作繁杂,组织上就将之前在基层派出所从事行政内勤的余文玉一并派去,成立了宜昌市第一家“夫妻警务站”。

“能和丈夫一起驻守警务站,其实也是组织上对我们家庭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要安心扎根警务站,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和村民之家来守护。”余文玉说。

走进警务站,接警台、服务台、调解室收拾得井井有条,后面的生活区简陋而温馨,充满着“人间烟火气”。余志明夫妇参与治安宣传、救助群众、治安巡逻、入户走访、调解纠纷、信息核查工作,积极构建社区一刻钟、农村半小时“服务圈”,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夫妻俩驻守青林寺中心警务站,在工作和生活,时间和节奏高度同频共振,是亲密的伙伴和战友。

夫妻同在警务站工作,上级如何监督?宜都市公安局主动实施实时督查与终结督查,流程检查与节点检查、专项督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法,科学设置合理的监督考核指标,考评细则和积分规则,制定出台“红黑榜”,让夫妻俩既能安心工作,又能在青林寺落地生根,切实为群众服务。



夫妻齐心护平安

“这次村里扩宽道路,涉及几十户居民,有户居民担心修路会影响到自家住房,始终不同意地被征收。”青林寺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廖丰说。

得知情况后,余志明夫妻主动上门做工作,一次不见就去两次,两次不见就去三次,最终被请进了家门。

“我不是不配合,是担心修路会影响到房子。”居民刘某说。

对刘某的担心,余志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了5年的拆迁难题最终得以解决。

近年来,随着古镇开发、征地拆迁等建设项目的增加,青林寺村人员密集,矛盾纠纷及各类隐患显现。“社区里的麻烦事、困难事,只要他们上门去说一说,基本上都能得到解决。”高坝洲

派出所所长邓绍华说,夫妻俩通过“有事上门促促和,无事串门聊聊天”的形式,打牢了社会治理民心基础。

围绕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宜都市公安局始终把派出所“强基工程”作为系统研究制定警务站布局建设总体规划,实现警务工作重心下移到一线,实现基层治理由量变向质变升级,构建起多元共治、条块协同、上下联动的基层治理体系。

在余志明看来,“夫妻警务站”是新时期“枫桥经验”在宜昌的具体实践。“调解纠纷时,我主要讲法律、讲政策,会对当事人有紧迫感,加之我的性格较为急躁,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她会立即上前缓和气氛,从小处入手,摆事实、讲道理。”余志明说,他从法律上来处理问题,而余文玉则从女性的角度,以柔情化人。

去年,青林寺村警务站辖区里一对离异夫妻

因争夺儿子的抚养权,闹得不可开交,余志明多次调解,但效果不明显。就在他觉得棘手时,余文玉带着儿子去了对方开的商店,以给孩子买玩具的名义,解开了这位母亲的心结,成功化解了矛盾纠纷。

夫妻携手共进步

余志明在入户走访中得知,78岁的熊大爷卧病在床,因身份证遗失,就医时无法报销新农合医保。余文玉随即带着相机上门,帮熊大爷及时补办了身份证。

“走访中了解到村民需要帮忙的,只要是警务站能及时办理的,都会立即办理;超出受理范围的事,会记录下来协助办理。”余文玉说,今年警务站主动为村民办理各类小事305件。

村级治理工作千头万绪,小小警务室,工作琐碎繁杂,余志明夫妇从点滴小事做起,尽心尽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交代,村民遇到问题,24小时都可求助警务站。

余志明夫妻俩在护学执勤中发现,经常有孩子因家长无法及时来接而滞留。每次执勤时,夫妻俩又多了一项任务——无偿开展“代理妈妈”爱心活动,把校门口“留下”的孩子接回警务站,陪他们吃饭、做作业、玩游戏,直到家长陆续赶来将孩子安全接走。

近年来,青林寺村以“近邻党建”为抓手,以“夫妻警务站”为载体,主动联系驻镇的公、检、法、司、交等政法部门,组建“田间普法宣讲队”,在田间地头、村民家中,入户走访“点对点”精准宣传,“屋场会”中“面对面”“泡茶”“做客”等形式入户普法,提高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青林寺村是著名的“湖北民间谜语村”。去年国庆长假,青林谜镇的大片粉黛子草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天有数千名游客涌进。余志明夫妇和派出所同事一起,贴心为游客做好服务。

“我们是夫妻,也是同事,遇到事情好沟通,在处理事情时她眼神提醒我,我就会调整好状态。晚上回来,她会帮我分析:今天调解时,你哪句话说得好,哪句话说得不合适。这样一来,我下次调解就会更注意,工作效果更好。”余志明说。



图1 余志明夫妇正在组织调解。
图2 余志明夫妇在辖区开展反诈宣传。
图3 余志明夫妇在警务站为群众办事。
图4 余志明夫妇在辖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熊波 摄

苗斌：快乐工作就是最好疗法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王洪岩

“最近强对流天气多,纠纷和求助类警情也多,为及时应对突发情况,我们全部屯兵街面,有警处警,无警巡逻,遇到警情第一时间进行处理。”7月22日,河南省郑州市区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未来路派出所所长苗斌带领辅警一边巡逻一边商议着紧急情况下的警情处置工作,湿透的警服紧紧贴在身上。

苗斌所在的派出所每天接警数在110起左右,大部分是电动车丢失、小区住户车辆被堵、顾客与店主发生纠纷等这样的琐事,但不管大小警情,民警都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确保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无论是在疫情防控一线,还是在日常工作中,苗斌一直冲锋在前,用坚守和付出赢得辖区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赞誉,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荣获“郑州市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2021年12月,苗斌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实感身体不适,确诊为一种罕见的恶性淋巴瘤。得知诊断结果,他躲在卫生间里让眼泪尽情地流,然后擦干眼泪,微笑着对家人说:“现在医疗技术这么成熟,这都不算什么病。”他在化疗期间,还通过电话了解派出所工作情况,大部分同事都不知道他在住院治疗。

2022年1月初,郑州市区出现新一轮疫情,他所在的派出所辖区出现确诊和疑似病例。当时,还在化疗中的他对家人说:“我的病好得差不多了,现在疫情防控任务这么重,我要尽快返回派出所工作。”看着他对工作执著的样子,家人含泪同意。

会觉得不舒服。快乐工作就是最好疗法。”

当辖区群众得知苗斌患病的情况后,看他在核酸检测现场维持秩序,心疼地为他送来热水和凳子,他笑着说:“我身体好了,累不着。”

考虑到疫情防控时期,有的居民情绪焦躁不安,苗斌带领辅警给封控小区拉来音响,播放红色歌曲和轻音乐,以缓解大家情绪,活跃社区气氛。

在同事们眼里,苗斌的工作热情和生病前一样,甚至更高涨,还是以前那个大家信赖的“定海神针”。

今年进入夏季以来,苗斌所负责的辖区治安情况较为复杂,市场、医院、工地等场所不时有警情,苗斌带领辅警常态化开展动态巡逻防控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守护群众平安。

“我家的车位被人占用,无法联系上车主。”7月15日一早,正带领民警巡逻的苗斌接到群众报警求助,两分钟后,他们赶到现场,经过信息查询,联系上车主。经现场调解,占用车位的车主表示不再乱停车,矛盾得以解决。

“有人打架。”当天中午,苗斌和教导员王科迅速赶到事发地点,经询问了解情况后,将双方当事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

“夏天天气热,大家情绪容易急躁,一些小纠纷警情会多发,事情不大但关乎群众安全感,一定要及时化解。”空闲之余,苗斌会给辅警们讲解如何处置化解矛盾纠纷的技巧和方法。

“派出所小案件多,但每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防范和打击。”苗斌说,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中,派出所紧盯民生“小案”,严查快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电信网络诈骗、传统盗窃、养老诈骗等多发侵财犯罪,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同时,针对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寻衅滋事、群众斗殴等带有季节性特点的违法犯罪,采取雷霆手段,突出“快、准、狠”,坚决依法打击,切实提高治安控制力和群众安全感。



图1 苗斌(左)在了解社区情况。
图2 苗斌(右二)带领辅警实地调查了解治安防控情况。
图3 苗斌(右)在走访辖区群众。



图为陶钧(左二)正在参与会议案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供图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他审理的多起案件入选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他不拘泥于固有模式,创新多种调解方式;他撰写175余案件审理指南,统一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认知分歧。他就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三级高级法官陶钧。

2003年,陶钧进入北京法院系统担任书记员,两年后,24岁的他通过考试正式成为一名法官,此后仅5年时间,陶钧就荣获“北京市法院双优法官”,从业19年,他先后获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模范法官”“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2022北京榜样周榜人物”等诸多荣誉。在这背后,是5000余件陶钧承办及参与审理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积累,其中不乏多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围绕“M MONALISA及图”的“蒙娜丽莎”商标之争历时10年,近日终于尘埃落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该案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一审原告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对于2001年我国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适用规则,各自具有历史延续的商标注册使用边界、商标延续申请注册等诸多争议较大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对相关类案的日后判定带来了广泛的示范意义。

陶钧,是本案的承办法官。此前他审理的“同济”商标争议案、“约翰迪尔”侵害商标权适用惩罚性赔偿案、“MLGB”商标争议案等多起案件均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评选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以及北京法院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陶钧用一篇篇优质的裁判文书,展示着首都知识产权法官的智慧。

“法院不仅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要真正化解纠纷,形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在这样的理念下,陶钧不拘泥于固有的审判模式,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和创新工作机制,建立了适用不同案件的“多元引擎”调解法、“利益分析成本释明”调解法、“情感关怀”调解法等全新的调解方式与理念。

陶钧：多学习方能找到审判最优解

陶钧在审理一起专利合同纠纷时,发现案件不仅标的高达近3亿元,处理结果更可能会影响到上千名职工的生计问题。为此,陶钧打破单一坐堂问案的传统方式,将矛盾化解与案件调解贯穿于审理始终,注重每个环节的司法释明工作,原告法定代理人因刑事犯罪被羁押而导致原告公司无人管理,为彻底化解纠纷,他与合议庭成员一同到监狱内会见了原告,向其详细介绍了本案的审理情况,耐心解答其提出的各种问题。经过全面、细致的调解工作,彻底化解了这起关乎职工就业的知识产权纠纷。

“调解工作花费的精力往往大于判决,但每次看到当事人从矛盾的对立面回到理性的谈判中,再到握手言和,心中都会有种特别的喜悦。”陶钧说。

在知识产权领域,新技术、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在北京法院,陶钧的工作不仅是审理案件,还要针对各类新问题开展调研等工作。谈到学习,陶钧说他喜欢看大量的案例和书籍,“通过多学习,看过的案件和书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当需要对某个法律问题作出选择时,就能够比较好地分析判断,在审判中找到最优解。”陶钧还有着爱记录的好习惯,判决书或专业书籍中好的观点、心得等,他都会逐一记录下来,几年下来,便攒了厚厚几大本。

面对年均近两万件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一、二审案件,如何公正、高效地解决审理中的疑难问题成为北京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的难题。陶钧作为此类案件的调研组组长,组织调研组的其他法官,先后梳理了全国法院的万余份裁判文书,筛选出几百个典型案例,归纳概括成具体裁判规则,最终形成了175条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初稿,并经过十余次修改,经北京高院审委会讨论通过后正式对外发布,有效地统一了此类案件中诸多问题的认知分歧,也为“类案同判”打下了基础。

就这样,陶钧用扎实的法学功底、饱满的工作热情、不倦的工作拼搏,勇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奋进者、开拓者 and 奉献者,用奋斗奏响新时代青春的“最强音”。